

主动公开意味着自觉接受监督

目前,北京已陆续有13个区县公开了2014年预算情况,涉及数百个区县委办局、街道办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石景山区31个部门同时公布了工资福利和在职人员情况,这也是北京区县级政府首次公开人均工资福利情况。(见《新京报》)。

公开,有主动与被动之分;预算公开,是公开含有具体项目的支出预算安排,还是公开只有收支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等?这些都将对群众监督、社会监督产生不同的影响。主动公开也就意味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监督与被监督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,如何监督、监督什么,这些通常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如何让监督变得更加

有效、更加全面?是人们常常思考的问题。被监督的单位和个人,对于监督的态度如何,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?这些可能都直接影响监督的质量与效果。

石景山区31个部门首晒人均工资福利有助于公众监督。面对此举无论赞扬还是质疑,毕竟相对于被动公开,甚至被曝光后仍然想方设法“瞒天过海”的做法,要积极的多。在上级文件没有“硬性”规定之前,主动公开人均工资福利,自愿接受公众的监督,获得更多的应该是理解、支持和赞扬,理解这样的心情,支持这样的做法,赞扬这样的勇气。

我们试想,如果每个地区都像石景山区这样公开人均工资福利,又有谁还

会对一些领导干部的工资“感兴趣”?谁还会把领导干部的工资视为“机密”?恐怕少之又少,也许销声匿迹了。如果领导干部都主动公开个人工资、个人资产、个人住房,把不涉及个人隐私且能够公开的事情全部公开,而不是藏着掖着躲着,群众的监督也就更加简捷有效,至少节省了调查了解的环节,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,很少再出现“人肉搜索”的现象。

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。像石景山区一样,一些地方或单位敢于主动公开人均工资福利、“三公经费”详细开支等群众关心的敏感事项,自觉接受公众监督,从一定程度上说,这些地方或单位在这些方面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,为大家做出了榜样。一个人能够主动接受公

众的监督,无论从勇气还是信心来说,都非常让人钦佩。如果每个领导干部时时处处都能做到“不做亏心事”,所做之事、所发之言合情合理,也就没有不敢公开的了,欢迎监督、主动接受监督渐渐也就常态化了。

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,就是要像石景山区公开人均工资福利一样,敢于公开、主动公开,把群众最关心、最敏感,而且依据法律又适合公开的事项,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公布于众。这样做,不仅便于公众监督,而且还有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。人人之间少了一层“窗户纸”,自觉接受监督,干工作、办事情以诚相见,能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促进本职工作上,这既是人心之所向,也是发展之所趋。 申国华

“有偿删帖”能删掉一切吗

删一条帖子500元至2000元不等,每月结一次账,直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……公关公司主动出击搜寻政府、企业负面信息后,再通过相关网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删帖,并支付一定费用。在此过程中,公关公司还成功拉拢到了一名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的民警。(3月26日《新京报》) 我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,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传播环境的日渐放开,信息呈海量级甚至银河级的涌现。“有偿删帖”不仅在信息量的增长上作了减法,还直接导致了人们相对的信息匮乏。

被曝光出来的个案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灰色产业,是怎么在各取所需中完成的利益输送。在这个利益链中,公关公司可以说是幕后推手,这是他们的主要生财之道。在巨大利益诱惑下,网站工作人员、公职人员等相继被其腐蚀,共同谋取不正当利益,结成利益共同体。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任何一方来看,似乎已形成一个“多赢”的完美格局,殊不知,被埋葬的不仅仅是真相,还有他们自己的未来。

市场经济环境下,有需求就有市场,一定的市场需求在客观上助长了“有偿删帖”产业的形成。企业、个人、政府部门遇上负面新闻,首先想到的不是正视问题,用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,而是想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网站来删帖,用金钱做交易也在所不惜。拿钱摆平负面新闻,无异于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,这种行为只能更加有力地反证了真相是什么,“有偿删帖”会让当事人陷入“一错再错”的恶性循环。

“有偿删帖”背后的网络权力寻租现象,对社会存在一定的隐患。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,根据删帖的主要内容来看,涉及的大都是一些敏感问题,经过散播后容易引起较高关注度的问题。然而,这类问题也往往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,是与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相关的问题。所以说,“有偿删帖”删掉的是内容,消除的是一时的负面影响,但从长远来看,并不能消除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隐患。

监管人员监守自盗,使潜规则变本加厉,更使公权力蒙羞。如果公权力一定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,那也只能是与人民至高无上的利益相联系。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,是将权力商品化的过程。在这里,权力被物化了,转化为商品货币,进入消费和财富增值环节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,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。因此,发现并遏制各种领域中的权力寻租现象,依法惩处违规违纪人员,并加大违法成本,才有可能铲除此类事件的祸源,这也是“有偿删帖”案件带给我们的警示和反思。 宋华

根治民营医院坑人顽疾 唯有深化医改

约定的人流手术标价880元,但最终一个手术变成三个手术,花费竟超万元。这是日前发生在宁夏银川一家民营医院的现实场景。据报道,这家民营医院不仅“挖坑”害人,还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。

把消费者骗上手术台再漫天要价,这是不少民营医院的牟利手段。这样的坑人把戏,为何至今仍然大行其道?不少人把问题归结于监管不严,这固然是重要原因,但从民营医院运作方式以及现行医疗体制看,民营医院定位不清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、医改不彻底等因素,也不可忽视。

民营医院拼命追逐利益而不顾治病救人,这种行径无论如何不值得谅解。不过,就现行医疗体制而论,民营医院很难与公立医院竞争。这一点,只要看公立医院往人满为患,民营医院多数门可罗雀,便可一目了然。再加上民营医院多数是专科医院,患者本身就少,这不可避免化其“宰客”心理。

破解民营医院坑人顽疾,理应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入手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,要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,创新社会资本办医机制。去年年底,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》指出,要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向规模化、多层次方向发展,实现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分工协作、共同发展。这是深化医改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明确信号。

相关改革措施,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前医疗资源不均衡状况,另一方面,可以借助社会资本扩大医疗服务整体规模,提高公立医院服务水平。一旦充裕的社会资本(如原先开办民营医院的民间资本)能够进入更多医疗投资领域,既可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出路,满足公众多元化、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,也有利于减少民营医院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态。当然,这样的前提是厘清政府责任,坚持医疗服务的非营利性,从总体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。

实际上,民营医院也可以是非营利性机构。办医院是许多富豪乐意为捐赠的公益事业。如邵逸夫、李嘉诚等华人富豪,在内地就捐建了不少非营利性医院。只要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引导,加强监督管理,更能吸引更多内地民间资本创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,进而提高社会办医的管理和质量水平。 魏英杰



一年来,简政放权成为新一届政府改革的主题词。从上海自贸区试水“负面清单”,到国务院各部门晒出“正面清单”,“权力家底”越来越阳光化、透明化。但在一些地方,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存在偷工减料、原地踏步,只改“壳子”、不改“里子”,与中央要求、群众期待相比还有不小差距。这正是: 放权放手有市场,该管善管见真章。 权力清单莫画饼,断腕方有改革长。 文/言者 图/春鸣

重荣誉轻待遇不只是学术境界

“我带头自我革命,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所推动。”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公开表白他请辞资深教授如初衷。(3月26日《武汉晚报》)

身体大不如前,有些力不从心,仍享受资深教授的待遇觉得不合理,章开沅教授四辞资深教授,“荣誉”可以终身,待遇应该退休”,如此珍视荣誉而不恋待遇,无疑凸显出学者令人敬畏的襟怀和境界,同时也不啻是给改革院士增选和退出机制提供了一种思路。

不辞职谓特殊待遇,资深教授章开沅显然有点“傻”,而像他一样“傻”的实际上不乏其人,比如去年11月,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

业大学表达了退休意向。所不同的是,前者终于等来了“基本同意”的好声音,而后者则被“硬拉着不放”。

资深教授、院士主动请辞,表现出对荣誉的敬畏和名利的淡泊,无形中给院士制度变革释放了一定的压力,减轻了一定的阻力,这种来自个体难能可贵的自觉、主动姿态,理当受到官方的推崇和珍惜,何以反而都受到官方程度不等的强势挽留?没有退休先例,缺乏制度依据固然是一个方面,“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,还要靠你说话呢”,或是更为关键的因素,说白了就是某个或几个部门基于对院士商业价值、功利开发最大化的需要,令院士欲退而不能。

前年院士大会上,院士制度改革就已提上议事日程,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、不与物质利益挂钩,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、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等改革思路也已理清。资深教授、院士的请辞之举,不失为用行动呼吁院士改革春天的到来,他们的无私境界也必将成为助推改革成果的重要动力。而有关方面的盛情“挽留”,同时也说明了院士制度去物质化、利益化的必要性,这不但需要依靠制度设计,同样离不开有关方面秉持学术第一、大公无私的境界,真正做到珍视学术,不恋功利。

范子军

“先辟谣,后限牌”,公信何在

据新华社报道,3月25日19时,杭州市政府宣布次日开始汽车限牌。此前的限牌传闻已经让杭州车市几度升温,但杭州车治堵办等部门多次辟谣,称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,限牌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。

杭州可能限牌的消息,从2011年就开始流传,几年时间,在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十余次辟谣,甚至就在几天前,杭州治堵办还“无此消息”,可转眼就以实际行动为谣言正名。尽管突袭式发布限牌消息,已有广州、天津等地的“经验”在先,杭州这次出尔反尔的做法,还是引来了更多批评。

如果是为了正当理由,限牌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。最先推行汽车限购的北京,在政令发布前一周,进行了意见征集,至少给了市民心理缓冲期。随后的广州、天津等地,已是等而下之,搞

的是突击发布,当时舆论就多有批评。现在杭州非但没有汲取教训,反而是“比差”路数,如此搞突袭,凸显了政府部门的言而无信。 无论出尔反尔还是搞突袭,城市政府可能会说有“苦衷”,担心提前泄露限牌消息,会导致购车量的爆发式增长。但问题在于,似是而非的各种谣传,已经数次催热杭州车市,让很多市民把买车计划提前。就在杭州要宣布限牌前夕,“新闻通稿”已在网上流传,一些4S店也拿到“绝对准确”的消息,并开始大力促销。

换言之,汽车销量非正常猛增并未避免,反而搭进去了政府公信。为什么一些4S店比民众更早知道消息?在敏感时刻,更早一些知道消息,就意味着把握一次谋利机会。还有媒体报道,此前杭州有“神秘买家”突击买进100多辆车,该土豪总计花了千余车牌。很多网友也追问,他是有内幕消息的投资,还是看风向的“豪赌”?不管哪种情形,都说明政府的暧昧行为,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。在混乱中,很可能暗藏着内幕交易或腐败行为。 随着这种做法渐成“惯例”,其负面“外部效应”也开始蔓延。据报道,一些还未限牌的城市,市民因为担心突击限牌,已经开始提前谋划买车,比如南京不少4S店看车买车的市民,已是平时的两倍。地方政府言而无信,可能连累的是政府整体公信,民众容易变得“宁信其有不信其无”。

敬一山

受贿千万 岂止是“学位房惹的祸”?

据《羊城晚报》报道,李伟明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长、天河区文化局局长和天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,共受贿人民币逾1230万元、港币10万元。

在教育局长任上,李伟明主要通过“出租”教育配套权力给地产商而得利。他只是把一个初中部放在一个开发商的楼盘内,就一举获得一套价值296万余元的房屋;他帮助二三十个朋友、亲戚的子女解决读书问题,又轻松得到200多万元的“回报”。

李伟明不会错过任何把权力变现为个人资产的机会。他管辖下的学校建筑、维修工程、教育预留用地、酒店娱乐经营许可证以及牌照变更等等,都为他带来大笔的收益。

从庭审报道里,我们看到李伟明在出租权力时都一帆风顺,很少遇到障碍。我们知道,无论是教育局、文化局还是文广新局,照例都会有若干副局长,都会有书记副书记,还会有纪检部门,但在做教育资源配套、教育预留用地、经营牌照变更等决定时,局长为什么能这样“如入无人之境”?难道局长身边的人都像时间那样不知道到哪里去了?

其实他们哪儿都没去,上下前后左右的人一个都不少,但掌握一方大权的人往往不会让旁人染指实权。按照人的天性,多数人都希望能够独享权力的盛宴,只是在酒足饭饱之后,才可能让渡权力的零头。副职们知道,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,那么与其与

正职强求分享,不如做个顺从的配合者,至少做个沉默者,这样才有机会获得权力“零头”。

一个独揽大权一言九鼎的掌权者,配以不敢也无法与之抗衡的身边人,又没有来自外部监督制约的权力架构,这造就了一片平整无障的权力旷野,让掌权者能够在旷野里信马由缰自由驰骋。

李伟明被判无期徒刑之后,曾与他共事的天河教育局某工作人员对记者说,“李伟明今天的结果,其实都是学位房惹的祸”。

是的,在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时,学位房自然就“钱”途无限,而李伟明恰好掌握了学位房安排配套的生杀予夺大权。这种大权让他致富有期,最后也让他坐牢无期。从表面上看,好像成也学位房,败也学位房。

这说明学位房是李伟明走上职务犯罪的诱因,但不是唯一的诱因,更不是惹祸的根本原因,根本的原因还是让权力有效纵机会的机制。

权力寻租既是馅饼也是陷阱。假如我们对“馅饼”设置足够的篱笆,让掌权者无法轻易偷食,并让他们看到足够的风险,而不是只见馅饼不见陷阱,那么掌权者就不敢轻易萌生贪腐念头,也无法如愿完成贪腐行动。何龙

“倒卖死者信息”何以能成一门好“生意”?

如今,在殡葬业中存在着一灰色利益链,护工卖死者信息赚钱、医院“内线”倒卖死者信息,一条可获利1400元,不法丧葬中介从中大肆牟利,从业人鱼龙混杂……医院、殡葬中介、墓地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根利益链条,不少逝者亲属在承受亲人离去的痛苦时,还要忍受着“黑殡葬”的各种算计。(3月26日《现代快报》)

事实上,医院“内线”之所以成为上述链条上的重要角色,死者信息之所以如此有“含金量”,很大程度上,其实并非医院“内线”唯利是图,或是漫天要价。恰恰相反,在丧葬产业链上,死者既是最不可或缺的资源,只要获取了这一资源,便可以从死者身上获取可观的利益,丧葬产业链上对于这一高利润资源的争夺必然激烈。这就好比之前的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烧钱大战,之所以舍得烧钱请人打车,根本在于在争夺移动支付的人口,当然不能说乘客或出租车司

机贪小便宜。同样道理,医院“内线”倒卖死者信息,而且还能卖上高价,也不过是丧葬产业链对于资源入口的激烈争夺罢了。

乍一看,既然医院“内线”掌握的死者信息都被炒成天价,似乎说明丧葬行业的竞争相当激烈,按说,行业激烈竞争之下,公众应当从中获得更多的实惠才是,何以“死人产业”始终暴利惊人,公众更是只有任其宰割的份呢?

之所以呈现如此吊诡局面,当然并非丧葬产业链上是假竞争真垄断,而在于这一行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,并缺乏基本的规范。于是,所谓“竞争”几乎只存在于对死者资源的争夺,一旦锁定需要丧葬服务的死者之后,竞争便完全消失,逝者的丧葬流程也便只能听天由命、任人宰割。尤其是公众普遍对于这一行业并不熟悉,对其中的价格猫腻,当然也更不可能明察秋毫,名义上的“服务一条龙”,最终演绎为一条黑色暴利产业链,也就绝不意外了。 武洁

“责任教育”莫错位

最近社会上有一种现象:父母将自己财产无私地给了子女,却将自己养老的责任留给了政府、社会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,许多社会矛盾由此引起,这是“责任教育”缺乏带来的社会问题,这份本该由父母承担的教育任务,现在推给了学校、社会,造成了这方面的错位。

一位外籍华人教育子女的方法,引人入胜,也许可以从中获益。最近朋友从澳洲的墨尔本探望读研究生的女儿回国,谈到去女儿的监护人为其过生日的趣事。这位50岁澳籍女华人的生日仪式上,每位出席的嘉宾依次送上礼物和祝福,轮到她的两位正在读书的15岁大儿子、12岁小儿子时分别送上的却是信封,信封内是两份契约,承诺当工作后每月拿出10%工资给母亲养老,母亲则抚养其成人,百年后房子归其继承。当时在场的国人露出了惊愕神态,老外们却不以为然。这位母亲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是诚信的澳洲公民,不会找政府的麻烦,孩子们享受我的权利必须尽到义务,担当责任。今天是特殊日子,大家可以见证,小孩也可以记住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,我们时下有些“80”、“90”后的独生子们缺乏这种责任意识。在充分享受父母权利时忽视了自己应尽的责任。责任教育的第一责任人

应该是父母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,古人云:“养不教,父之过。”不能把应由自身担当的责任推给政府和社会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,家庭必须担当起相应的责任。

解决“责任教育”问题,首先是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让其深入人心,明辨是非。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家庭教育,使每个家庭深知自己的担当,让家长子女能够入耳入脑,见之于行动。

其次,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,古人云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人必须具备这种责任意识,才能治国安邦,管好小家。今天很多人因为忙而放松了对孩子的这种“责任教育”,或者感到与孩子难以沟通而放弃了这份教育,实不知后患无穷。

再次,营造这种担当责任的社会氛围。在全社会倡导向他们有这样精神的人和事看齐,像他们一样,勇于担当,而不是冷眼以对,袖手旁观,必须积极行动,在尽到家庭责任的同时,对他人保持诚信,友善谦卑,而不是见利忘义,损人利己。

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。父母的辛苦浇灌培养才能成就孩子的未来。千万莫将这种“责任教育”的任务完全推给学校,造成教育责任的错位,人生“责任教育”这一课,父母不容推卸,否则恨之晚矣。 谢京辉